

相验证。^① 1927年10月,孙本文在《中国文化区域之研究》一文中倡导运用美国文化区域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区域。^② 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系统阐述以都市工业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成为30年代倡导中国工业化的领军者。费孝通等在全面抗战时期撰写的《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成为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的代表性成果。在政治学界,陈之迈于1945年12月至1946年9月分三册出版的《中国政府》、萧公权于1945年12月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均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经典作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亦强调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1946年7月,邓初民在《新政治学大纲》一书中申明,马克思主义“新政治学”应成为中国革命人民“新的斗争武器”和“新的战术战略”。^③ 以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充实了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使民国学界初步实现了社会科学中国化。

综上所述,民国学界构建的社会科学理论强调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其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以唯物辩证法深化了此种科学观念,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同时,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理论的构建存在由引介西方范式,到融会、创新西方范式,形成中国自身范式,再研究中国问题的发展过程。这亦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过程。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不乏启示意义。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持开放心态,与世界整体研究全面接轨,更要结合中国情况,进行自身理论创新,还要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理论指导。

民国学术的清学传统

李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民国时期人文学术的演进史上,中国古典学术一直充当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角色,特别是与民国距离最近的清代学术。甚至可以说,对于民国人文学术的建立和发展,清学实际起着奠基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清季民国学者非常重视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和总结上,体现在民国学术的学风与方法上,而且民国年间居史坛主导地位的新历史考证学实际也是继承和更新清学的产物。

众所周知,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清代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中国古典学术演进至此,已是绚烂至极,在清代学者的进一步努力下,有了集大成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晚清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挟其船坚炮利之优势,把一个与中国固有文明截然相异的文明强行输入中国,西学借此大举进入,与中国古典学问相遭遇,双方相激相荡,相通相融,促使中国学术在面貌上发生了根本改变,无可选择地走上新途。这两种情形已然昭示,与其他时代相比,清代学术实具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对其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显然至关重要。

①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文化论》(What Is Culture),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页。

② 孙本文《中国文化区域之研究》,孙本文《文化与社会》,东南书店1930年版,第31—36页。

③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自序,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1—2页。

在对清代学术的总结方面,清季民国之时的学人最有发言权,因他们多系清学之子,自身学术从清学中衍生出来,对清学的利弊得失具有切身体验与感悟,同时又生逢西学涌入、正统学术衰微之际,最想从对有清三百年学术的回顾与总结中,获取更新学术的资源,从而使中国古典学术适应新的时代,走上向现代学术转化的道路。于是,章太炎的《馗书·清儒》、《清代学术之系统》,刘师培的《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以及王国维、胡适等人的相关论述,先后纷纷问世,对于奠定清学史研究的学术根基起了巨大作用。

对于清季民国时期的清学史论述,有学者曾归纳出几个研究范式,如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等。^①实际上,不论哪种范式,都与立说者立说时所处语境和所持立场息息相关。章太炎、刘师培曾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民族主义者,立志排满复汉,其学术论说必然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梁启超、胡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建构“理学反动说”的,并将之和考据学具有“科学精神”的说法相配合;钱穆是因不满意梁启超的论述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并以宋学为导向,用“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释清学史;侯外庐则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社会史为基础,结合社会思潮,对清学之兴起提出自己的主张。由此类推,作为政治上认同前朝、视“民国乃敌国”的罗振玉,以“遗老”立场书写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似也代表了一类清学史论述,虽谈不上是一种范式,但也丰富了民国时期的清学史研究类型。

既然清学史的研究范式都是基于研究者的立说语境和立场,那么清季民国之时的清学史论述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史总结了,其所承担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要服务于现实需求。事实也正是如此。清季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清学史著述是这方面的一个显例,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体系与学派背景使得他们笔下的清代学术各呈千秋并各成体系,同时他们皆关注学术的当下情状,能把从清学中汲取的有助于学术更新的因素与西学新知相结合,贯彻于自身的学术实践,力图由此建立起中国近代学术。民国之时梁启超、胡适、钱穆、侯外庐等人的清学史论述同样如此,也是基于民国学术的现状与问题,力求从清学的演进脉络中,发掘出有助于现实学术发展的要素。只不过由于学术背景、学术环境、学术主张的差异,各人对清代学术的不同面相各有侧重,具体评价亦有区别,甚至大相径庭。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不同视角的总结,均为构成民国学术底色之作。

二

正由于清季民国的学者研究清学史有应对西方学术体系进入中国,希冀从对有清三百年学术的回顾与总结中,获取更新学术的资源,使中国学术能够适应新的时代的用意,故学者们在对清学的解读和评价上,不时有和西学比附之处,尽力从清学中寻找适应近代社会与学术发展的因素。

众所周知,清学的核心是考据学,如何看待考据学,是撰写清学史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清季和民国两个时代都有清学史著述问世的梁启超的看法较有代表性。在1904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

^① 陈居渊《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认为考据之学“敝中国久矣”,学者“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道死而已”,^①丧失了经世致用之志。如此评价,否定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梁启超一生以多变、善变著称,在对考据学的评价上也是如此。进入民国后的1920年,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再论考据学时,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指斥它的种种弊端,反而认为考据学之“无用”体现出更纯正的学术精神,“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②这样的说法,显示梁启超对于清学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变化,清季批评考据学的无实无用,此时则又赞赏考据学的为学问而学问,从致用转向了求真。若从中西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很显然古希腊以来的求真理念、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恰是中国学术传统中相对缺乏的。不断浸润西学的梁启超,在已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1920年,以西学标准看待考据学,自然会得出肯定性的结论。

不仅是对清代考据学按西学标准笼统肯定,梁启超等人还把考据学与西方科学联系起来,引入科学视角评估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试图从中寻求一条既与西方接轨、又能保持中国传统的学术更新之路,从而为国学学术开出新途。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梁启超一再强调清代考据学与西方科学相近,将之视为自己论清学史的一大特色。他将戴震考据学及其求真求实的精神视为西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翻版,只是“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科学界,则时代为之也。”戴学诸公之所以成就巨大,“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③即认为从精神到方法,考据学皆能与科学相媲美。胡适对清代考据学与科学之关系的看法与梁启超惊人地相似,他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清学宗师戴震是深通此‘清学的真精神’的。”^④经由梁、胡两人的共同努力,以戴氏考据学为代表的清代学术近于科学的说法,在当时广为流传并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进而对民国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起到导向性作用。

梁启超、胡适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为尺度来解释与评估清代考据学,其目的是想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发掘出西方式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以利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很显然,这是特定时代的特定做法。相对于西方科学的广泛性和在自然、社会各个领域的探索精神,仅在经史领域用力的清代考据学,确难与之相提并论,侯外庐先生曾明确表达过此类见解。^⑤但在科学不甚发达、中西学术交融互动仍为主流的民国之时,梁启超、胡适这样的比附之论,也不失为发展新式学术的一个路径。实际上,民国学术后来的发展表明,此一路径是走得通的。

三

五四后的民国学术中,考据学在文史学科仍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有学者将民国时期的考据学称为新历史考证学,也有学者称之为新汉学,尽管称呼不同,但都公认这方面成就巨大,甚至是当时历史学科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当然,奠定其学术根基的仍是清代考据学。

一般认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是王国维成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于1917年著成《殷卜辞中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2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1、37页。

④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85、300页。

⑤ 参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370—372页。

所见先公先王考》之时,其形成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既基于20世纪初四大新史料——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又得益于新史学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梁启超在清季倡导新史学时,已疾呼史家要革除因袭附会之积弊,奋发独立思考之精神,在研究中扩大史料范围,“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①强调新史家在自觉树立求真求实理念的前提下,从事严密的历史考证。这样的主张,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精神和思想方法来追求的,具体到历史学科,便是主张以科学、实证方法为武器,通过历史考证,实现史学研究上的求真求实目标。胡适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②并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个字,^③作为建设新学术的纲领,对于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起到重要推进作用。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垣、顾颉刚等史学大家虽在不少方面理念有异,但在学术实践中,都以求真求实为治史目标,对于中国历史的诸多方面,开展了科学、细密的考证工作,发前人所未发,树立起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典范。在他们的带动下,运用新观念和新方法探讨传统学问、开展实证性研究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全国许多大学相继成立旨在以科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史之学的机构,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齐鲁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等皆是如此。傅斯年1928年组建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成为新历史考证学的骨干力量。这些机构基本上都以审查史料、扩大史料、比较研究为方法,研究人员分工配合,有组织地开展对于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考证研究,经多年积累,取得巨大成就,使得新历史考证学成为民国学术的一面旗帜。

所谓“新”历史考证学,自是要区别于“旧”,区别于清代考据学。那么,“新”在何处呢?西学因素的引入,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恐怕是关键所在。清季民国之时,欧洲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史学,美国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等等,都陆续进入中国,对中国史坛影响甚巨。它们的具体主张各异,但亦有共同特点,即皆强调严格审查史料或材料、重视实证或实验,与清代乾嘉学者无征不信、广参互证的治学精神与方法,不无可相参照之处。实际上,胡适所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治学箴言,既是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方法的极简概括,也是基于对乾嘉学者研究方法的继承,他将之用作整理国故和考证史实的基本出发点,也就表明了新历史考证学的中西兼容的特质。虽然标榜的是“新”,但其源头仍为“旧”,没有清代考据学作根基,民国学者大概也很难一下子把实证史学、兰克史学、实验主义等引为知音,毕竟内因是决定事物变化的更主要的因素。当然,此时他们评价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是用了近代眼光,以西式的是否合于科学来做标准,如胡适就认为钱大昕、王引之、俞樾等人能取得成就,是“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但他们是“不自觉的”,“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④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受到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方法的影响,但中国传统的辨伪、疑古思想,特别是清代考据家崔述等人对他的影响更大,他所创立的“古史辨派”更多是渊源于清学传统而来。傅斯年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倡导科学史学,发扬兰克史学精神,视搜集史料为第一要务并标榜“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态度,但仍服膺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的考据学,把“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列为史语所治学的第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九,第10页。

②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一集,第321页。

③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第527页。

④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一集,第322页。

一条宗旨,因为他们以毕生精力搜集、考订、辨正史料,“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①可见傅氏心目中的新历史考证学,根基还在于清代考据学。只不过在吸收清代学者之长处的同时,他主张还要进一步扩张研究的材料和研究的工具,这自然是现代历史学对于科学的史学研究的要求。

可以说,以新历史考证学为代表的民国人文学术,在精神和方法上都与清代学术一脉相承,很多学术论题,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大师所做的具体考证工作,不少都是清代学者所提出而未完成的学术命题。尽管有学者认为:“近代学人所指称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用后来的一般科学常识观念观察认识的认识,未必合于清代学术的本相。”^②但这并不妨碍清学对民国学术有重要影响的基本判断的形成,即使民国学者对清学的估价可能有误解的成分,可大家共同关注于此,反恰说明清学的巨大魅力和现实价值所在。

要重视对民国学人群体的研究

郑大华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我们研究民国思想文化,离不开对民国学人群体的研究。学人群体的大量出现,是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独有的风景。清末多是政治团体,而很少学人群体,如保皇会、政闻社等各式的立宪政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各式各样的革命团体,这都是政治团体,就是国粹派,也是一身而二任,既是政治派别,又是学人群体。而到了民国时期,除政治团体外,大量的学人群体出现,学术界通常都把这些学人群体称之为“什么什么派”,如“新青年派”、“东方文化派”、“现代评论派”、“甲寅派”、“学衡派”、“新月派”、“独立评论派”、“新路派”、“村治派”、“中国农村派”、“战国策派”、“新观察派”,如此等等,大约有二三十种之多。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会出现这么多学人群体呢?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尤其是留学欧美学成归国者成为民国学人群体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据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的估计,清末至民国我国官费或自费到欧美日本留学的学生至少在10万人以上(有学者估计是30万人)^③。除极少数滞留未归外,这10多万留学生绝大多数学成后都回到了国内。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收录留学生1152人,其中学成归国者1131人,回国率高达98%以上。^④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什么什么派”,基本上都是以留学生为中坚形成的。与清末的保皇会、政闻社、同盟会等政治团体的成员比较,民国时期学人群体的成员有以下不同特征:清末政治团体的成员大多是1880年以前出生的,和那时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出生后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学习的是儒家四书五经,其中不少人还考取过进士、举人、秀才的功名,后因时代的变化,他们顺时而为,通过种种方式(如短期的出国留学,或上国内新式学堂,或自学),学习了一些西学,掌握了一些西学知识,但程度十分有限,没有也不可能对西学有系统深入的了解。故他们属于新旧过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② 桑兵《分说: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桑兵、关晓红主编《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

③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0页。

④ 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枫城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